

大国政治的悲剧 (修订版)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UPDATED EDITION)

JOHN J. MEARSHEIMER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 著

王义桅 唐小松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大国政治的悲剧 (修订版)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UPDATED EDITION)

JOHN J. MEARSHEIMER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 著

王义桅 唐小松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政治的悲剧/(美)米尔斯海默
(Mearsheimer, J.J.)著;王义桅,唐小松译.一修订
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ISBN 978-7-208-12461-5

I. ①大… II. ①米… ②王… ③唐… III. ①国际政
治-研究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0703 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封面装帧 王小阳

大国政治的悲剧

(修订版)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 著

王义桅 唐小松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0 插页 4 字数 435,000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461-5/D·2531

定价 58.00 元

现实主义是西方基督教 世界的理论(代译序)

王义桅

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理论,因为国际关系的概念、体系、逻辑都源于西方,反映西方思维,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是具体分析起来,人们往往忘记了这一点,甚至产生国际关系理论“源于西方而属于世界”的错误认识,潜意识中认为西方“发现”了国际关系理论,理论的解释、运用则超越西方,具有普世性。这反映出中国人对理论的渴望——传统中国文化不善于产生西方那样的理论,对中国特色理论的向往,更重要的是对西方、对现代性的迷信。

对国际关系理论最原始、最经典的现实主义理论分析表明,西方并非发现而是发明了现实主义理论,并在西方遭遇非西方世界冲击时产生出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流派,然而本质上我们仍然生活在西方世界或西方化世界,故种种关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都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的分歧。

一些人以乌克兰危机进一步证实现实世界仍然是现实主义世界,其实应补充一句:这仍然是西方基督教内部世界,因为俄罗斯的东正教也是基督教的一支(另两支是天主教、基督新教),俄欧(美)矛盾仍然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矛盾。美国试图通过乌克兰政变消除俄罗斯从文明道统上挑战基督教文明的合法性及俄罗斯复兴的可能性。俄罗斯自称“第三罗

马帝国”，笃信东正教，不受教皇管制，有自己独立而分散的教派体系。俄罗斯的历史和宗教发端于“基辅罗斯”。没有作为俄罗斯文明发源地的乌克兰，俄罗斯在文明道统上便无法挑战西方。苏联解体以后，美国不断挤压俄罗斯复兴空间。乌克兰是“俄罗斯帝国的钥匙”，也是华盛顿“策反”乌克兰的主要动机。美国外交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意义：“失去了乌克兰，俄罗斯将不再是个帝国；有了听从使唤且服从（俄国）意志的乌克兰，俄罗斯自动成为帝国。”¹美国通过乌克兰内部变更政权，试图赶走俄罗斯黑海舰队，使之在克里米亚无法立足，砍断俄罗斯借此影响中东事务的地缘-军事途径，导致俄罗斯策动克里米亚公投入俄及东乌克兰脱乌运动，演变为乌克兰危机。

西方舆论所谓中俄伊（朗）联盟挑战西方霸权的说法，再次证实了现实主义理论乃基督教世界理论的看法。西方担心来自非基督教文明的挑战，并将世界的现实主义性回归怪罪于它们，言下之意就是“我们超越了现实主义逻辑，你们将世界带回到现实主义”。其实，是世界的现实主义性在回归，并非什么现实主义理论回归。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后西方世界崛起的提法一度甚嚣尘上，现在西方舆论又在炒作世界回归现实主义，其实都是表明世界不再是西方世界内的循环，西方理论作为地方性理论的本质日益明显。²

中国学界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探讨并未跳出西方的逻辑，认清其本质。现实主义理论不是被证实或证伪的，它只能被超越。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便是这种超越的集中诘问。

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性

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性，在最原始、最经典而流行最广的现实主义理论身上得到最鲜明的体现，集中在以下方面。

思维起点：神性—人性—国家性

现代西方国际关系起源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的诞生，也就

是先有“国”再有“际”。三十年战争(1618—1648)后所诞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民族国家、主权、外交、国际法等基本概念,使得国际关系概念产生于欧洲,并传播至亚洲、非洲、美洲等地。

葡萄牙是西方第一个民族国家,最早实现王权-教权分离——把恺撒的给恺撒,把上帝的给上帝,此后便迈入对外扩张的征程。可以说,国际关系是西方基督教内部关系,在“均势—打破均势—均势”间维持动态平衡,但其背景则是基督教的向外扩张。因此,尽管欧洲之外的地区也存在势力均衡现象,但并非近代欧洲的均势;产生于欧洲的均势论,也就不适用于其他地区。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推动人性从神性中解放出来,三十年战争又将国家性予以释放,诞生现代国际关系理念。这就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起点:人性本恶,故权力本恶;国内是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国际是民族国家林立,势力均衡。人是自私的、理性的,故国家是利己的、理性的。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国家对权力、利益、安全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导致权力、利益、安全的稀缺性。人性的张扬导致国家性张扬,西方基督教内部是血腥拼杀,对外则是野蛮扩张、掠夺、殖民。这就产生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逻辑:以权力追求安全,以实力争取利益。

思维方式:国内-国际二分法

为了表明人性张扬导致的国家性张扬合法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杜撰出一个先验论——无政府状态(anarchy),以便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区别开来——其本质是国际关系缺乏像国内那样的中央政府权威,并非真正的无政府(chaos)或无序(disorder)。望文生义的翻译常常导致对西方理论的误解。其实国际关系中仍然是有法则的,古典现实主义推崇实力均衡法则就是对自然界平衡法则的延伸。因此,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描述的国际社会并非无法无天,现实主义各流派对国际法、国际道德、国际规范也是承认和尊重的,只是从根本上不相信它们能维护安全、保护利益而已——权力才是根本的。假定“无政府状态”是为了引进“自助体系”(self-help)概念。民族国家的结盟(alliance)、跟着强者走(bandwagon)、均势(balance of power)等逻辑就是在“天助自助之人”的信念下

展开的。这种假说在柏拉图的“原初状态”、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假说中一再得以体现，是非常基督教式的思维方式。

现实主义的挑战者——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在修正“无政府状态”假定和“国内-国际”二分法，然而本质上并未动摇其逻辑，而是国际关系不完全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关系的折射及西方无法主导世界的反映，但毕竟国际社会迄今未走出西方世界或西方化世界的影子。因此，现实主义仍然是最有说服力的，在中国也是信徒云集。

思维过程：原罪论导致宿命论

现实主义理论反对线性进化论思维，认为世界历史走不出某种循环，颇具宿命论色彩，更证实了基督教的原罪假定。

如前所述，人性本恶的原罪假定，导致国家权力本性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假定。人与人如狼、国与国如狮的霍布斯状态，使得战争成为国际关系的常态。尽管按照米尔斯海默的分类，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所谓人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流派，但其共同属性仍为宿命论，只是应对宿命论的方法不一。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便公开宣称，中美冲突不可避免。

思维结果：你是现实主义的，我是自由主义的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发明的，理论来源于西方，却是为别人发明的。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对此做了很好的阐述。他写道：“（美国人）认定美国是世界政治中的慈善力量，而把美国现实或潜在的敌人看成误入歧途或胸怀恶意的麻烦制造者。”³

欧洲的情形更进一步，笃信线性进化论，以后现代—现代—后现代眼光看世界，觉得其他国家尚生活在自己的历史中，还在玩现实主义那套，而自己则要去规范它们。因此，在欧美学界产生“中国只懂现实主义逻辑”那种鄙视性认识。一些中国学者也因此盼望中国尽快以康德、洛克而非霍布斯思维看待世界，似乎在力争上游。

自美国崛起为西方首强，国际关系的西方性就呈现出鲜明的美国性。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以理论性替代理论，正如以普世性装扮普世价值

一样,试图主导国际话语权。这一点,在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米尔斯海默以美国基督教强烈的天定命运观——开始是开发西部,后来是让其他国家人民皈依美国基督教——直接奠定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基础,即最大权力才能获得最大安全,而最大权力不可企及。米尔斯海默说的是海洋的阻遏作用使全球霸权不可能——其实是国家非上帝,不可能获得最大权力——因而不可能获得最大安全,故此产生大国政治的悲剧。

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性

有人提出古印度、古代中国也涌现了众多的现实主义理论家,现实主义理论怎么只是基督教世界内部理论呢?其实,英国学派代表赫德利·布尔和一些华裔美国学者挖掘古印度、古代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思想,只不过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是为了证实西方理论乃普世理论而已。

就拿现实主义最经典的理论——均势论来说,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都有均势术,而无西方均势论。古印度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321—184年)奠基者月护王的顾问考底利耶(Kautilya)在其经典著作《政事论》(亦译作《实利论》)(Artha-sastra)中即提出了两大政治现实主义原理或策略,即弱肉强食或曰大鱼吃小鱼(law of the fish)及远交近攻。⁴在古代中国,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和三国时期蜀汉联吴抗魏都是均势术的极好演绎。古人云: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话极好地揭示了均势律的真谛,也蕴含了丰富的东方智慧,如孔子的“中庸之道”、老子的“无为而治”。但是,由于东亚以朝贡体制为主要特征的国际体系与西方民族国家体系存在本质的不同,均势术上亦有很大差异。故而人们倾向于认为均势有其特定的条件与环境,主要是近代欧洲大国的游戏。在古代中国,战国时期、三国时期,甚至清末民初的军阀体系比较接近于近代欧洲国家体系,故有均势术之运用。但是,由于无主权观念,甚至无国家概念,因而与欧洲均势有所不同,主要是一种军事均势,而且充其量也只是天子精

神制约下的诸侯游戏，天下归一的概念和欧洲封建林立的秩序根本不同，更不用说东方的国家概念与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概念也不是一回事儿。⁵

梁鹤年先生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中指出，“洋为中用”之前，先得搞清楚“洋为洋用”是怎么一回事儿。⁶ 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的结合，也是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基因。因此，要超越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性，必须首先明白国际关系何以为理论。

笔者曾提出“国际关系的理论性”命题，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到了追本溯源、反思其主体性的时候了。从回答“国有际吗”、“国际有关系吗”、“国际关系有理论吗”这三个基本问题入手，反思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自身维度问题（即国际关系的理论性），探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先天不足与终极趋向。⁷

的确，国际关系的提法是值得推敲的，何谓国，何谓际？西方基督教语境下的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其实是 interstate relations（“失败国家”就称为“failed state”而非“failed nation”）。换言之，国际关系并未涉及国民关系层面——近年来公共外交大行其道就是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吧。Nation-state 在日文里翻译为“国民国家”，的确更贴切。此外，“际”是否为“inter”，而不是“intra-national”、“trans-national”或“super-national”relations 呢？

作为世俗文明的中国不会产生西方那样的国际关系理论，这就不足为怪了。⁸ 所谓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只是模糊认识；本质上，在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性，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不以 national-state 为基本单元探讨国际关系理论，这就有待后西方世界的真正来临。

现实主义何以回归现实世界

人的认识往往滞后于时代变迁，国际法则也往往滞后于权力结构的变化。我们仍然生活在西方化世界，故此现实主义大行其道不足为奇。所谓西方化世界，是指其他地方仍然依照西方法则、在西方影响下行事。比如东亚，传统体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垂直“天下”体系，近代以来西方传

入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横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造成东亚纷争不止。要让亚洲成为亚洲,这是亚洲远离西方现实主义的前提基础,而非美国人所担心的“门罗主义”。

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引领后西方世界来临的希望集中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身上,关键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将第十章改写为“中国能和平崛起吗”,是将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最终检验。他就中国崛起后亚洲出现战事的必然性做出了论述:“简而言之,我的看法是如果中国在经济上继续增长下去,它会希望像美国统治西半球那样统治亚洲。而美国会百般阻挠中国实现这种区域霸权。北京的多数邻国,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和越南,都会和美国联手来遏制中国的势力。这样一来就会有一场激烈的安全竞赛,战争的可能性相当大。”《纽约时报》的评论附和说,这是21世纪的核心战略问题:“在历史中,我们很少看到权力从一个霸主转向另一个霸主的过程是和平的。”⁹且不说俄罗斯联手美国来遏制中国的情形与当今世界事实多么相悖,就说中国统治亚洲的想象多么不靠谱。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亚信峰会上指出:“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地区安全事务,侵害其他国家正当权益。”¹⁰

其实,不是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问题,而是西方(主要是美国)能否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的问题,或西方基督教世界能否接受世俗文明崛起的问题。美国的天定命运观与例外论在这个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美国政府领导人口口声声说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但当中国真正和平崛起为像美国那样的国家时,美国无论如何是无法接受的。正如奥巴马总统2010年4月15日在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所言:“如果超过十亿的中国居民也像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现在这样生活,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因为那是这个星球所无法承受的。所以中国领导人会理解,他们不得不做出决定去采取一个新的、更可持续的模式,使得他们在追求他们想要的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应对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挑战。”¹¹

现实主义的源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循环,止于多元世界的来临。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命运是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西方基督教世界不再成为主导,现实主义也就如决斗一样过

时,像青铜器、纺织机一样要放在历史的博物馆了。

说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在证实或证伪现实主义理论,那是太抬举现实主义理论了。中国崛起,推动世界回归正常的多样性状态,超越了西方理论,特别是现实主义理论。因此,无论是美国华裔学者许田波、王元纲,还是一些中国学者,以中国的历史来验证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往往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或提出中国的古代现实主义理论,要么削足适履,要么沦为与西方一般见识,忽视中国并不只是国家,而是有别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独立文明体系。

2014年5月22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

注 释

1. 参见[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 王义桅:《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序,第7页。

3. [美]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4.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Edition* (Danbury, Connecticut: Crolier Incorporated, 1997), Vol. 2 p.397; vol. 16, p.336.

5. 参见王义桅:《超越均势:全球治理与大国合作》,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三章。

6. [加]梁鹤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序。

7. 王义桅:《国际关系的理论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4期。

8. 详见王义桅、韩雪晴:《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

9. [美]罗杰·科恩:《中国把“门罗主义”用到亚洲》,《纽约时报》中文网,2014年5月10日。

10.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21日,上海。

11. Interview with Barack Obama, 15 Apr 2010. <http://www.news.com.au/national/president-barack-obama-says-prime-minister-kevin-rudd-is-smart-humble/story-e6frfkvr-1225854306896>

中文版前言

《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中心思想是，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相互竞争。即便满足于和平生活的国家也会被指责参与了无情的权力竞争。

这种安全竞争的根源在于，当一国受到另一国威胁时，没有供它们求助的更高权威。在国际体系中没有守夜人。而且，国家永远无法确信其他国家对它们不怀敌意。因此，它们必须作好准备，应付来自各方的危险。我的邻居是我的朋友吗？今天的朋友会不会成为明天的敌人？我是否有足够的实力击退别国的攻击？在国家意图不明的世界里，大国必须尽可能多地获取权力来保护自身，以防任何国家的挑衅。

理想的结果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国，因为拥有如此多相对权力的国家，其生存几乎可以得到保证。相反，软弱只能招致麻烦，因为强国往往会占弱国的便宜。中国读者应该不难体会到这一点：1840年至1949年间，中国软弱且四分五裂，饱受世界列强的欺凌。

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获得全球霸权，主要原因在于，它们难以越过如大西洋、太平洋那样的大片水域而投送力量。即便当今如此富强的美国，也不能支配全球。然而，国家可以获得地区霸权，正如美国在西半球的所作所为。这样，任何大国的最终目标都是支配其所在的区域，确保世界的另一地区不会有大国成为霸权国。故此，美国曾全力阻止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及苏联支配欧洲，阻止日本支配亚洲。事实上，美国在击溃所有这四个野心勃勃的对手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我称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这一国际政治理论，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特别是，如果中国在未来数十年内仍然保持其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它也可能会建立起庞大的军事力量，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中国将会寻求地区霸权，因为优势地位是生存的最好保证。如果说美国的战略利益在于不让远处大国插手西半球的事务（这正是门罗主义所表明的），那么中国的利益所在无疑是将美国军队赶出亚洲。

当然，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这种竞争类似于美苏在冷战期间的那种对抗。

最后，我认为，尽管大国几乎总是按现实主义行事，但它们经常宣称自己受更高的道德目标而非均势的考量所驱使。而且，它们把对手描绘成邪恶或不道德的另类。这种行为模式在美国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在世界舞台上，美国常常举止粗蛮，却总是口口声声称自己的行为是道德的、正确的，而其对手的行为是邪恶的、错误的。这大概会引起许多中国读者的共鸣。他们一定已注意到，美国的精英们常常用理想主义术语谈论外交政策，却以现实主义方式行事。

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日益强大，其精英们将仿效美国，使用理想主义的辞令来描绘中国的外交政策。然而，中国会像美国一样，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如果生存是其最高目标，那么中国便别无选择；这正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约翰·米尔斯海默



2002年4月22日于芝加哥大学

英文修订版前言

1991年底苏联解体,我便开始写作本书,一写便写了十年。十年间很多美国人包括美国学者对国际政治的未来都十分乐观。因为既然冷战确实已经结束,未来便似乎不会再有大国战争,均势一类概念也就完全可以进博物馆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可以期待今后世界各国间将会出现更多的合作。而我等现实主义者失去了栖息地,必将为时代淘汰,步恐龙的后尘。

但我不服,便写书来打破天下太平的迷梦。依笔者所见,世界仍然危机四伏,现实主义也仍然是认识世界的有力工具。本书大部是笔者原创的国际政治理论,虽然同是现实主义,但与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理论都大不相同。创制理论还要以理服人,所以书中也用不少篇幅解释进攻性现实主义为什么适用于21世纪的世界。

本书2001年一经面世,并未大受欢迎,因为21世纪头几年众人仍然往往认为未来世界必定河清海晏、歌舞升平。但2004年伊拉克战争扩大,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线作战,进退维谷。公众又逐渐醒悟,发现反恐战争结束其实遥遥无期。20世纪90年代弥漫全社会的喜悦便烟消云散,人们开始既思考国际政治的惨淡现实,更思考美国向何处去。于是时至今日,美国人大都已经明白当代世界暗流涌动,而长治久安的办法不是子虚乌有,就是远在天边。

人们是该醒悟了,冷战结束25年来,美国已打了六仗。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1995年和1999年又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打了两仗。2001年

打阿富汗至今未完，伊拉克战争从2003年打到2011年倒是已经结束，但美国刚离开伊拉克，同年却又出兵利比亚。所以1989年以来美国每三年里就有两年要用兵。但这六场战争对手都是小国。美国不用担心大国强力干预。

但现在中国崛起，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国经济如果再迅速增长几十年，就要变成冷战后美国的第一个对手。而且中国崛起也确实震动了世界，最近皮尤公司全球态度调查研究了39个国家，其中23国受访者要么大多认为中国能取代或者已经取代美国的地位成为超级大国中的超级大国，要么虽意见纷纭，但持上述观点的人数最多。¹美国人也意识到了中国崛起，调查中美国受访者有47%认为将来中国是世界第一，而不这么想的人也正好是47%。

中国崛起是事实，问题在于能不能和平崛起。20世纪90年代末我就注意到中国可能成为超级强国，所以本书第一版曾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继续崛起，就要走强军路学美国统治西半球来称霸东亚。因为国家要生存，最好、最保险的办法无非是做地区霸主。但中国的邻国和美国一定会设法遏制中国，阻止其称霸。这就会引起安全竞争，最终威胁亚洲安全。

本书2001年出版之后，我在各种场合一直反复强调中国不能和平崛起。在别国这样讲，在中国也照样讲，2004年还曾与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辩论过这一问题。²头几年不管我费多大口舌，听众不是无人相信，就是半信半疑。但是2008年以后便不然，因为其时中国一方面继续崛起，一方面挟积累下来的实力开始活动筋骨，结果既吓坏了邻国，又惊动了美国。如今我再讲中国不能和平崛起，未来中美关系险恶，大家已经很能听进去了。

既然中国崛起大概算21世纪最大的大事，而这件事又很可能是战事，那重写本书最后一章详谈这件大事便是题中之义。初版最后一章虽然涉及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但也只是涉及，与诸多内容并列，并不突出。笔者其他著作和文章又都未详谈此事。所以新版最后一章专谈中国崛起，要原原本本、扎扎实实，论述为什么中国实力大增，亚洲就有危机。

本书修订版重写了前言和第十章，其他内容大体不变。而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更不变。有些读者读到这里可能惊诧，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

在学界早已为人熟知,许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加以分析,甚至是严厉批评。各界学人关注该理论,我感念在心,对于批评乃至批判,也事无巨细,悉心听取。毕竟,自己的理论有人研究正是学者最大的光荣。但我相信自己的理论经得起批评。世界上固然没有终极真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有朝一日也要功成身退。但本书第一版建立的理论框架历经十余年风雨仍然坚固。

修订版最后一章便用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回答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这个广大学者、决策者及各国大众都十分关心并且要一直关心下去的问题。我也希望中国和平崛起,所以答案终究是:不能。

修订版最后一章的写成,并非我一人之功,首先有赖各位友人群策群力,各抒己见。他们是杰西卡·阿尔姆斯(Jessica Alms)、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迈克尔·J.里斯(Michael J. Reese)、玛丽亚-依芙·芮妮(Marie-Eve Reny)、迈克尔·罗利(Michael Rowley)、卢克·舒马赫(Luke Schumacher)和王元纲(Yuan-Kang Wang)。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更对我帮助良多。芝加哥大学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PIPES)项目举办研讨会,也曾讨论本书初稿。与会诸学者惠赐意见,更教益无穷。我对所有这些帮助深表感谢。若尚有不周之处,我当负全责。

最后还要感谢诺顿出版社编辑罗比·哈灵顿(Roby Harrington),出版修订版本书原本是他的建议。本来预定2011年初版十周年时付梓,但几经雕琢,最终还是好事多磨。正如本书初版十年磨一剑,所费的工夫也是大大超过笔者预期。我们相识已有25年,友情甚笃,我久蒙关照,受之颇为有愧。而除罗比之外,另有一位编辑丽莎·卡姆纳·麦凯(Lisa Camner McKay)具体负责本书修订版,此书能与读者见面,全赖她兢兢业业。

注 释

1. "America's Global Image Remains More Positive Than China's; But Many See China Becoming World's Leading Power," Pew Research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Washington, Dec. 8, 2013.

2. 辩论详情请见: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John J. Mearsheimer, "Clash of the Titans," *Foreign Policy*, No. 146(January-February 2005), pp. 46—49.

英文初版前言

20世纪是一个国际社会充斥着大规模暴力行为的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使差不多900万人葬身欧洲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期间有大约5000万人丧失了生命,其中半数以上是平民。二战结束后不久,整个世界又陷入了冷战的泥潭。在冷战对峙中,苏联及其华沙条约组织盟国从未直接与美国及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作战,但成百万的人死于朝鲜、越南、阿富汗、尼加拉瓜、安哥拉、萨尔瓦多等地的“代理人战争”;这一时期的其他一些战争,尽管规模小,但也异常激烈,夺去了数百万人的性命,包括1904年至1905年及1939年的日俄战争、1918年至1920年协约国对俄国内战的干涉、苏波战争(1920—1921年)、一系列的阿以战争及1980年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

如此暴力的循环往复,在新的千年里还远未终结。和平的愿望可能仍不会实现。因为塑造国际体系的大国相互提防,其结果是争权夺利。实际上,它们的最终目标是去取得凌驾于他国的支配性权力,因为拥有支配性权力是确保自身生存的最好方式。力量确保安全,最大的力量确保最大程度的安全。面对这一驱动力的国家注定因此相互冲突,因为每个竞争对手都想取得压倒他人的竞争优势。这是一种悲剧。除非塑造这种体系的国家同意组成世界政府,否则便难以逃脱这种悲剧。然而发生巨大转变的前景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冲突与战争注定会持续不断,成为世界政治突出而持久的特征。

当然,你可以不同意这种悲观论调,而是强调随着冷战的终结,20世